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东北全面振兴】

# 东北地区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 战略与路径

赵儒煜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产业技术体系有根本性、系统性变革的，具有更深认识自然水平、更高改造自然能力的产业技术体系。当前，正在快速推进的新产业革命就是相对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占据产业体系统治地位的传统重化工业体系而言的新质生产力的构建过程。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东北地区长期存在的“产业缺位”问题已深化为新质生产力的缺位。为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东北经济全面振兴，在战略层面上，要正确处理新旧矛盾，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选择正确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具体路径上，应消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传统思维障碍，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着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根据不同产业领域选择不同的创新主体扶植路径，充分发挥区域内外创新资源作用以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新产业革命；东北全面振兴

**【作者简介】**赵儒煜，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4)03-0031-08

当前，在新产业革命的冲击下，整个世界处于生产力变革推动生产关系调整的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之中。面对这样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共二十大报告发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赴黑龙江省考察期间，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其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提法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重大的理论创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要充分结合新产业革命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东北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的领域，重新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增长极的支撑点。

## 一、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

### （一）新质生产力及其一般属性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一般意义上，新质



生产力不是特指某种生产力的静态概念,而是指相对于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生产力而言的、具有革命性技术进步特征或发生质的变化的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具有辩证性的概念。

首先,生产力具有物质性和社会系统性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生产力的概念虽然历经长期的丰富和发展,但其本质仍然在生产力的物质方面,在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生产方式”并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生产力”上。<sup>[1]</sup>在这一语境下,生产力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其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利用、改造自然并使之转化为物质产品的能力;其二,生产力是一个社会系统,是整个人类社会全面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高度概括。因此,生产力既不是分工、协作之类可以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也不是零散的、单部门、个别工序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进步。生产力是建立在整个产业体系视域下的、人类社会意义上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物质世界的能力,其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是在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转为改造能力(技术化)的过程中成为其自身并不断深化、发展着的,三者共同构成整个产业体系,这种产业体系则包括技术层面上的产业技术体系和空间层面上的产业空间体系。简言之,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形成产业并出现产业体系之后集中地表现为产业体系中的技术部分,即产业技术体系。

其次,在一般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的产业技术体系而言的,是对传统产业技术体系有根本性、系统性变革的,具有更深认识自然水平、更高改造自然能力的产业技术体系。在此,根本性、系统性的变革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其一,这个生产力的变革必须是根本性的,使原来的生产力有本质提升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变革突出体现在历次产业革命中。其中,在农业革命中,人工种植对采摘农业的替代、化肥对传统农家肥的替代、转基因技术对选种技术的替代等,都是其例。在工业革命中,以纺织机、蒸汽机动力、煤炭为源技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对于手工作坊的生产技术体系就是新质生产力;同样,以电动机、电力、石油为源技术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当前以绿色技术、智能技术为源技术的新产业革命,都是使原产业技术体系发生本质

变革的新质生产力。其二,这个新质生产力是系统性地改造原产业技术体系的技术创新成果,而非简单的、个别技术的革命。中国古代曾有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些技术都没有改变社会生产系统,没有变成带动整个产业技术体系变革的源技术,因此没有成为新质生产力。

最后,新质生产力在终极意义上具有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趋势。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上的飞跃。因此,其终极目标是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类温饱等基本生存问题,工业革命则进一步解决生活品质和生产效率提升、劳动替代等问题,并最终朝着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自我解放的方向迈进。当然,并非历次出现的新质生产力都是没有瑕疵的,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局限性,人类的技术变革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会伤害长远利益,例如,化肥的导入、石化产品的滥用带来食品毒化、环境污染,给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恶性影响。为此,此次新产业革命中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主要领域推进的“再工业化”,就是要纠正以往工业化的错误,实现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以生物工程、医疗器械及药品为主要方向的“大健康”领域技术创新,也是要修复以往工业化不足给人类健康带来的伤害。

## (二) 新产业革命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当前正在快速推进的新产业革命是相对于占据产业系统统治地位的传统重化工业体系而言的新质生产力构建过程。此次新质生产力构建主要集中于四个领域展开:其一是再工业化领域,主要目的是纠正重化工业技术体系破坏环境、耗竭资源的弊病,主要技术路径是通过电动车替代燃油车,带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来替代相关传统技术;其二是大健康领域,通过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生物技术创新修复重化工业技术体系对人类健康的伤害,并推进农业技术革命;其三是智能制造领域,通过数字技术的导入,使生产过程智能化,解放传统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并部分替代脑力劳动;其四是智能社会,通过数字技术的逐步量子化,替代传统的信息交互形式,节



省社会运营成本,提高经济运转效率。

新产业革命在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都是相对于传统技术而言的革命性进步,同时也具有系统性的特征。这是因为,第一,再工业化领域的技术革命是针对内燃机、石油技术而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内燃机、石油、电力技术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源技术,通过技术唤起技术的方式形成了汽车、石化、电力等主要产业分支,并将其产业进一步细分,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构建起整个产业技术体系,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形成其对整个产业体系的统治地位。而电动车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的革命从汽车、能源技术入手,必然会循着产业技术内在关系构成的产业树各个分支,逐步波及整个经济,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重化工业体系,直至重建相关产业链、产业分支和产业体系。第二,智能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是对所有生产技术体系和社会服务技术体系的智能化改造,其扩展深度和广度虽然会因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之异而在不同部门有迟速之别,但其革命性、系统性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社会服务,一旦某重要服务端采用了智能方式,必然要求其他社会服务端与之相适应。现实中,我们因疫情防控而采用智能手机扫码出行的管理方式,这一基本要求客观上带来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管理的智能化,智能手机扫码认证、网上政务服务等已成基本要求。而生产智能化则正在逐步从对接市场的C2P向链接产业链内部的P2P、实现生产过程柔性化的机械智能化方向发展。第三,大健康领域的技术变革,使得新产业革命更加全面地覆盖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以往的产业革命集中于解决生产过程的问题,而忽视了人类健康的需要。新产业革命的大健康技术变革则补上了以往产业革命的缺口,使产业革命更加全面地满足人类自我完善的需求。

毫无疑问,此次新产业革命不仅具有产业技术变革的飞跃性,而且具有改变人类生产力现状的社会系统性,是相对于我们目前经济系统中运行着的重化工业技术体系的重大变革,是正在创造新质生产力的力量。中共二十大发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号召,而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sup>[2]</sup>,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载体和成果体现。在此背景下,以上述四大领

域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正是东北振兴的当务之急。

## 二、东北振兴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长期以来,“东北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东北经济振兴进展迟缓,其主要原因在于东北的区域产业技术体系仍然留恋于重化工业技术体系不能自拔,经济萎靡源于“产业缺位”,而治理方式老化,“体制固化”遗患难除<sup>[3]</sup>,使得东北地区在新产业革命中发展迟缓,产业竞争力低下,新动能培育不足。

### (一) 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

东北地区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靠生产大宗基础工业品而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坚强基石,但这些工业品除汽车、机械外,多为低附加价值的原材料、基础产品,这使得东北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调配机制逐步退出而走向低迷,产业创新动力不足,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对滞后,出现了“产业缺位”的现象。

东北的“产业缺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第一,以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资源型产业及机械、化工、汽车、纺织等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逐步失去优势甚至退出;第二,以生物医药、计算机电子设备、航空装备、轨道交通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优势减弱或发展迟缓;第三,因资源枯竭造成基础经济部门中煤炭、钢铁、石油、森工等资源型产业的缺失。

东北地区的“产业缺位”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客观结果,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体系整体推进技术升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深化的。其中,既包括“渐进式”改革开放中世界市场对东北地区“固步自封”的传统产业体系的强大冲击,也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在全国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对原有支柱产业的“产业替代”的无奈。这两个现象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推进,东北地区“产业缺位”现象进一步深化为新质生产力的缺位。在整个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新质生产力性质的新产业革命源技术相关领域产业占比极少,有的甚至出现退步现象(见表1)。东北三省的主要产业(工业总产值占比前十名的产





业)基本上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基础产业,甚至还有煤炭、黑色金属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基础产业,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的主要产业只有通信设备类产业。而处于新产业革命前沿的智

能技术相关产业、电动车相关产业则处于慢性萎缩状态。如辽宁省在2003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尚有5.92%的占比,位列十大产业之六,2021年则已退出十大产业。

表1 东北三省产业体系基本框架(工业总产值占比前十名产业)

(单位:%)

产业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2003年	2021年	2003年	2021年	2003年	2021年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6.81	2.74	2.28		14.91	10.8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5.13	14.73	5.44	7.27		3.8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021年为汽车制造业)	8.27	8.89	59.40	53.34	6.13	
通用设备制造业	6.26	1.1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99	0.96	12.83	7.80	2.67	2.7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92			1.4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88	6.96	4.78	7.65	9.72	9.0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52	1.07	4.28		29.72	6.88
农副食品加工业	4.32	1.17	7.44	7.50	5.46	11.9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2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4.01		2.55		2.5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96				
医药制造业			5.31	4.53	3.4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96	2.69		2.40
饮料制造业			1.95			
烟草制造业				1.39		
食品制造业					3.50	3.9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3.43	3.33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2003年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分别来自2004年和2022年的《辽宁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目前,新产业革命带来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重构进程已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智能产业等新兴产业技术快速发展,正在引领现代产业体系重构;另一方面,新产业革命使资源型产业在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降低,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正处于被替代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曾经的“产业缺位”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依靠传统优势产业的延续或者回归来解决,而必须依靠新产业革命技术创新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通过“产业替代”的方式来解决。因此,曾经深为东北经济痼疾之源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产业缺位”问题,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已经进一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

## (二) 深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东北地区“产业缺位”现象的长期存在,造

成了东北经济结构的偏公惯性,带来了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体制问题。其根源在于由“产业缺位”嬗变而来的“体制固化”。具体而言,传统优势产业缺失,诱发地方政府为重现辉煌而采取倾向性支持政策;资源枯竭,导致相关城市为实现转型升级而严重依赖于中央及地方政府补贴。而由于东北传统产业的主体为国有经济,所以,上述政策主要向国有经济倾斜,形成扶植传统优势产业的制度惯性。同时,这些政策大量占用了本已不丰的财政资源,也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条件,进而严重阻滞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影响了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进程。这种制度惯性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影响甚大,大专院校、国有企业虽然有创新潜力,但往往创新动力不足,潜力不能转化为能力;民营经济虽然有创新动力,但整体发展滞后,动力背后没有能力支撑。而这种制度惯性



也迟滞了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升,难以借助外部资源的导入来培育新质生产力。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深化,破除东北地区的体制惯性,成为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东北地区的“体制固化”导致地方政府在培育技术创新核心力量上收效甚微。东北地区拥有较好的科研资源,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也有长春光机所等高水平的科研院所,在国家级的科技成果上也有突出表现。同时,一汽、沈飞、大庆石油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占据着规模庞大的人才、财政、技术研发设施、产业化基础设施等创新资源。但是,在产业技术创新上却迟滞不前,跟不上新产业革命的步伐。这是东北地区由“产业缺位”而“体制固化”导致的。如前所述,东北地区传统优势的基础加工产业“优势缺失”“高新产业缺失”、低端原材料产业中“资源型产业缺失”的“三缺失”态势,早在新产业革命之前即已形成,并在2003年前后促成了第一次东北振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这种长期形成的态势使得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于有传统优势、有制度支持、有巨大的社会稳定需求并一度认为应该有较好政策效果的传统优势产业,下大气力去扶植已经失去优势的汽车、机械制造等产业部门。但是,这种制度惯性忽视了这些部门已经面临新产业革命下被淘汰的命运,更没有想到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上。这种制度惯性导致对传统优势产业部门——实际上也是央企、国企集中的领域——扶植制度的固化,客观上造成了东北地区主要产业部门依靠制度优势而非市场机制生存的局面。加之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是采取了依靠国家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转型升级的模式,使得东北经济的政策依赖性更强,市场化改革推进迟缓。于是,国有企业占据大量资源,但热衷于已是夕阳产业的自身的“起死回生”。民营经济则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比不高,也无力支撑新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的巨额投入。由此可见,由于“体制固化”的影响,使得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产业技术创新主体被固化为只关注再创辉煌、关注当下社会稳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路径被固化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而非技术创新,客观上造成了东北地

区产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不足,东北新质生产力培育迟缓。

其次,东北地区的“体制固化”使得营商环境治理相对迟缓,难以借助外部资源导入来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在政策导向长期偏公的惯性下,产业垄断逐渐固化,使得市场竞争环境治理、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保护等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不仅阻碍了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也使得山海关外的民营资本望而却步。如前所述,选择扶植国有经济所在的传统优势产业,是地方政府摆脱眼前困境的首选。干部任期制、首长决策制则强化了这种首选的现实性。产业革命非一朝一夕可至,国有企业的关注点不在于此,民营经济无力为此,在此背景下的各届政府最佳选择方向往往只能是维系最大的社会安定。这种政策思维方式使得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所在的传统产业领域在一届又一届政府的主导下延续着垄断扶植政策的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进一步占据了国家政策的主要资源,吸引了主要的优秀人才,但由于垄断了市场利益而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最终导致自身发展缺乏底力。汽车产业向电动车转型的滞后就是最好的例证。于是,垄断而衰退,衰退而扶植,扶植而垄断……形成了产业垄断的制度惯性。在这种偏公惯性下,市场竞争环境建设相对迟缓,甚至一些外来资本因可能分割当地大型企业的蛋糕而被行政性地拒绝进入;一些外来投资项目在进入后因得不到良好的行政服务而采取了享受优惠政策后即撤离的策略;管理部门服务意识薄弱而一直以管理者自居,未能帮助民营企业快速解决运营中遇到的行政程序难题;市场化改革深化程度不够,营商环境的法制化仍待细化,地方行政法规在消费者保护、民营企业保护等方面都有较大缺失。总之,由于“体制固化”带来的长期偏公惯性,使得营商环境治理得不到足够重视,民营经济规模不足,难以承担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创新主体使命。

最后,“体制固化”使得东北地区整体上处于新产业革命参与度不高的状态,新质生产力培育严重滞后。其一,“体制固化”使得东北主要国有经济在技术创新上迟疑观望,落伍于新产业革命的进程。具体而言,“体制固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集中大量财力、人力去扶植传统优势产业,一方



面可以保障大型国有经济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努力为国有经济延迟产业升级的窗口期。但是,由于东北地区主要国有企业借助政策优势,形成区域垄断,使得其技术创新惯性倾向于原赛道上的技术改良,而非新产业革命赛道上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创新惰性使得东北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各省前十大产业中鲜见其名。其二,“体制固化”为扶植传统优势产业,沿袭了传统的财政倾斜、市场分割等政策方式,占用了东北地区本不丰裕的财政资源,削弱了非国有经济的创新动力。众所周知,新产业革命往往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强烈的创新欲望支撑。在当前的新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竞争中,华为、比亚迪等大型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受“体制固化”的影响,拥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或创新欲望不强或专注于传统优势重建,即便有产业基础的汽车、机械等产业部门也对电动车和智能机械的投入不足。相比之下,民营经济的实力相对薄弱,其创新主体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一些科研院所虽有较强创新能力,但其创新活动往往与企业所需、市场所需相去甚远;营商环境改善进展迟缓,一些重大创新成果遭遇招商困难。其三,“体制固化”导致东北地区技术创新滞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人们消费能力下降,区域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撑能力大为削弱。一般而言,产业技术的进步都是以先进的经济体系为基本前提的,既要有技术良好的产业链,也要有对新产品预期强烈而财力雄厚的区域市场资源。这一点,在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过程中有突出的体现。而东北地区则既无处于前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无对创新活动启动期有强大支撑作用的区域市场。

综上所述,长期形成的“产业缺位”和“体制固化”造成东北地区在新产业革命进程中的相对迟滞态势,传统产业技术占据核心位置,经济下行压力大,迫切需要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实现东北全面振兴。

### 三、加速培育具有东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 (一) 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战略

东北地区增强发展新动能的重点在于“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此,需

要从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概,果断投入新产业革命之中。同时,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实现事半功倍的政策效果。

首先,正确处理新旧矛盾,果断推进以新代旧。东北经济之所以形成“体制固化”痼疾,除生产力方面“产业缺位”的客观影响,还有地方政府在管理思路上受到力求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惯性思维的影响。但是,在当前新产业革命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这种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旧产业技术矛盾激化的新时代要求。应该看到,摆在东北经济面前有两条道路。其一,继续扶植传统优势产业,被动等待新产业革命的成果惠及自身。其结果只能是新产业革命使所谓的传统优势产业要么退出历史舞台,如建立在内燃机技术上的汽车则必然退出产业体系;要么实现产业升级,如机械制造在芯片技术应用下升级为智能机械制造业。其二,主动迎接挑战力争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成为主要产业分支的技术发源地、技术传播者和产业分支体系的主导者。不论哪一条道路,传统优势产业的消亡和被替代都是不可避免的。目前,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这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的窗口期已经迫近关闭。一方面,新产业革命主要领域的技术变革已越过技术质变阶段。再工业化主战场的新能源车技术变革已经完成了电池市场化阶段,且在使用持久、耐低高温领域有重大突破;智能技术主战场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也在华为、中芯等的推动下突围成功,量子芯片试验成功,芯片应用也开始大举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新产业革命的主要参与者正在从大投入的风险期走进大回报的稳定期,技术垄断优势正在形成,市场统治力也逐步稳定,给后来者留下的余地日益狭小。这要求东北地区的决策者们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果断转向新质生产力培育。

其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市场机制引导。东北地区的“体制固化”惯性是阻碍其产业技术变革、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主要障碍。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是东北地区亟待确立的新发展理





念。这是因为，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市场运行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成立、运行和相对均衡都是由这一需要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实现了长期稳定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特色坚持了市场经济“需求第一性”这一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论断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导，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决策者们囿于比较优势论、资源禀赋论等基于“供给决定论”的西方经济理论，执着于以政府资源对自认为有技术优势的传统产业、有产业工人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植，而忽视了“需求第一性”这一市场基本准则，忽视了这些产业都是正在失去需求支持的夕阳产业，客观造成了“体制固化”现象。因此，通过对市场机制的重新认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以有效地破除地方政府对传统优势产业的迷信。

最后，选择正确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一，积极投身新产业革命前沿领域，重新选择自己的科技垄断优势培育方向。目前，新产业革命主要领域的技术创新虽已初步完成了从旧向新的质变过程，但仍然存在继续深化的前景，如新能源车还没有开启走向太阳能车的产业进程；智能机械、智能生产系统领域还大有可为。第二，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发掘培育创新资源。东北地区有较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有经济的研究机构，有较高的技术创新潜力，亟待开发其科研潜力，提高其利用效率。第三，结合上述新产业革命态势和东北地区产业革命资源优势，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战略层面上，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应该在如下领域：其一，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车、太阳能车产业转移；借此发展风电、光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推进超轻材料、超低温材料、超导材料等新材料开发及产业化；其二，加速开发智能制造技术，重点建设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以智能生产改造传统产业，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其三，大力推进生物技术创新，建设从高品质种植到高质量中成药及保健品、绿色食品的现代中

医药健康产业分支，并延伸到建设康养、护理、旅游、赛事“四位一体”的身心保健全服务产业链。

## （二）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路径

在上述建设东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战略设计之下，应以猛药治沉疴的决心，对东北当前阻碍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问题加以快速、有效的整治，以深化改革的方式，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法制化建设为抓手，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扫清道路障碍。

首先，破除“体制固化”顽疾，消除新质生产力的传统思维障碍。其一，要转变东北地区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班子的思维方式，使之对当前新产业革命发展态势有清晰认识，正确理解传统优势产业退出历史舞台而亟待新质生产力替代的必然性、现实性和紧迫性，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从而在思维方式上彻底扭转对传统优势产业的留恋，树立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决心。其二，消除东北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经济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对政府财政支持的依赖思想，明确树立自主创新才是东北振兴出路所在的理念，理解靠财政补贴只是救贫之策而非致富之途的道理。其三，调整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将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中长期任务分割为地方政府、主要国有企业各级班子任期内的阶段性指标，避免决策者为保其任期业绩而采取短期行为，具体可在顶层设计中纳入组织编制《东北振兴新质生产力培育中长期规划》的部分，将东北地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程指标具体分割并使之成为考核领导干部能力的硬性指标。

其次，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破除政策偏公惯性导致的市场垄断倾向，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其一，切实落实产业准入白名单，将白名单内相关企业投资申报制改为备案制，撤销相关入市审批手续，重点鼓励电动车、智能机械、半导体、中医药等新质生产力主要产业领域的民营资本投入。其二，以地方性法规方式详细规定民营经济自主经营范围、违规处理方式及流程、管理部门管理职权及行使方式，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更新相关法规条文，彻底根除因人执法、因人管理的随意执法模式，建立良好的营商硬环境，消除民营经济投资者的顾虑。其三，向浙江省等发



达地区学习,在固定程序管理上,采取网上办公为主、窗口服务为辅的模式,把“最多跑一次”贯彻到各个领域;在行政服务深化上,采取“政府专班”的服务方式,指定专人专组跟踪重大投资项目、重点推进项目,随时随地解决企业遭遇的行政管理障碍,由专班专人想办法解决政府方面的问题。

最后,着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扶植创新主体力量。从如下三个领域入手:其一,确保创新主体多样化。一是以大学及科研机构创新为先导,以先进专利引导民营资本跟进产业化进程,实现分流程的主体接替,现阶段的芯片制造技术可以按此模式推进;二是调动国有经济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由国家发改委明确主要新质生产力培育任务中的央企、国企创新任务内容和时间安排,以央企、国企与大学、科研机构联合方式,推进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工作。其二,针对新质生产力技术成熟度不同的产业领域,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新能源车太阳能化以及新特中医药研发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尚未完成的产业领域,重点在于研发,可以采用大学、科研机构、国有经济研发先行、民营资本跟进的模式;在产业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并开始公共化的智能技术领域,重点在于应用,大力推进传统机械的智能化技术、智能工厂系统集成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一方面培育东北地区的智能机械制造业,另一方面则对东北地区传统产业机械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其三,以建设优质营商环境为抓手,使民营经济以创新主体身份进驻新产业领域,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主力军。

##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就。新质生产力在一般意义上是相对于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生产力而言的、具有革命性技术进步特征或发生质的变化的生产力。从产业体系的视角考察,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产业技术体系有根本性、系统性变革的,具有更深认识自然水平、更高改造自然能力的产业技术体系。同时,新质生产力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对于传统重

化工业体系而言,当前正在快速推进的新产业革命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构建过程。

长期以来,东北经济全面振兴进展迟缓,其主要原因在于东北的区域产业技术体系仍然处于以重化工业技术体系为主的态势,“产业缺位”现象严重。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推进,东北地区“产业缺位”现象进一步深化为新质生产力的缺位,东北振兴已经不能简单地靠传统优势产业的延续或者回归来解决,而必须依靠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实现“产业替代”的方式来解决。与此同时,长期形成的“产业缺位”现象,造成了东北经济政策在制度安排上的偏公惯性,阻滞了市场化进程,导致东北地区在创新主体上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力量,营商环境治理相对迟缓,整体上处于新产业革命参与度不高的状态,新质生产力培育严重滞后。

为加速实现东北经济的全面振兴,在战略层面上,要正确处理新旧矛盾,果断推进以新代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市场机制引导;选择正确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构建东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具体路径上,要破除制度惯性的顽疾,消除新质生产力的传统思维障碍;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sup>[4]</sup>,破除政策偏公惯性导致的市场垄断倾向,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着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根据不同产业领域选择不同的创新主体扶植路径,以充分发挥区域内外创新资源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35页。

〔2〕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2期。

〔3〕赵儒煜、王媛玉:《东北经济频发衰退的原因探析——从“产业缺位”到“体制固化”的嬗变》,《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

〔4〕苏玺鉴、孙久文:《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重点方向和实践路径》,《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1期。

【责任编辑:田 华】





# 学人风采



赵儒煜，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顾问、常务理事，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东北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政府咨询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国际经济学、经济哲学等，提出以心理预期替代价格为“看不见的手”的新市场理论模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后工业社会反论》《国际经济理论问题探索》《产业革命论》《谁决定荣衰——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智人时代——预期支配的市场原理》等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等各级项目数十项。



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333工程”人才。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A类）、南京大学重点学科专门史（区域史）带头人、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席教授。兼任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2011—2012）、安徽大学特聘教授等。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和黄淮流域生态文明史。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社会生态变迁研究”“中国区域社会生态的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例”“中国经济抗战研究”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4项，省级课题4项。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中文、英文、日文论文100余篇。

逢增玉，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及理事、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期刊发表论文21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8部，合著与编著数十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省级和国际合作等项目近20项，学术成果获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2次和三等奖1次、中宣部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理论奖、中国文联及省级优秀成果奖数十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省市劳动模范及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近20项。

